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 当代文化理论

[澳大利亚] 安德鲁·米尔纳 杰夫·布劳伊特 著

刘超 肖雄 译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Andrew Milner and Jeff Browitt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文库
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Thought

当代文化理论

[澳大利亚] 安德鲁·米尔纳 杰夫·布劳伊特 著

刘超 肖雄 译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Andrew Milner and Jeff Browitt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化理论/(澳) 米尔纳,(澳) 布劳伊特著;
刘超,肖雄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10

(凤凰文库.当代思想前沿系列)

书名原文: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ISBN 978-7-214-11029-9

I. ①当… II. ①米…②布…③刘…④肖… III.

①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G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3598 号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by Andrew Milner and Jeff Browitt

Copyright © Andrew Milner and Jeff Browitt, 2002

This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in 2002 by Allen&Unwi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193

书 名 当代文化理论

著 者 [澳] 安德鲁·米尔纳 [澳] 杰夫·布劳伊特

译 者 刘 超 肖 雄

责任编辑 王 旭

装帧设计 陈 翌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16

印 张 16.75 插页 4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11029-9

定 价 45.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凤凰文库的出版宗旨是:忠实记载当代国内外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为推动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丰富的实践总结、珍贵的价值理念、有益的学术参考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资源。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人类文化的高端和前沿,放眼世界,具有全球胸怀和国际视野。经济全球化的背后是不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是不同思想的激荡与扬弃,是不同文明的竞争和共存。从历史进化的角度来看,交融、扬弃、共存是大趋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总是在坚持自我特质的同时,向其他民族、其他国家吸取异质文化的养分,从而与时俱进,发展壮大。文库将积极采撷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

凤凰文库将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建设,面向全国,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气派。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的背后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现代文明的培育,是先进文化的发

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中,中华民族必将展示新的实践,产生新的经验,形成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成果。文库将展现中国现代化的新实践和新总结,成为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和理论界创新平台。

凤凰文库的基本特征是: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立足传播新知识,介绍新思潮,树立新观念,建设新学科,着力出版当代国内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最新成果,同时也注重推出以新的形式、新的观念呈现我国传统思想文化和历史的优秀作品,从而把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凤凰文库努力实现知识学术传播和思想理论创新的融合,以若干主题系列的形式呈现,并且是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将围绕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中国化、政治学、哲学、宗教、人文与社会、海外中国研究、当代思想前沿、教育理论、艺术理论等领域设计规划主题系列,并不断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同时,文库还将围绕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科学文化领域的新问题、新动向,分批设计规划出新的主题系列,增强文库思想的活力和学术的丰富性。

从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大视角出发,从中国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独特性出发,中国已经并将更加鲜明地表现自己特有的实践、经验和路径,形成独特的学术和创新的思想、理论,这是我们出版凤凰文库的信心之所在。因此,我们相信,在全国学术界、思想界、理论界的支持和参与下,在广大读者的帮助和关心下,凤凰文库一定会成为深为社会各界欢迎的大型丛书,在中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中,实现凤凰出版人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献给我们各自的伴侣：万瑞提·博格曼(Verity Burgmann)、
娜迪亚·卡斯特里隆(Nidia Castrillón)，还有我们的孩子：大卫
(David)、詹姆斯(James)、罗伯特·米尔纳(Robert Milner)以及海
伦·布劳伊特(Helen Browitt)。

致 谢

衷心感谢我们各自的伴侣：万瑞提·博格曼与娜迪亚·卡斯特里隆，还有我们的孩子：大卫、詹姆斯、罗伯特·米尔纳以及海伦·布劳伊特，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至关重要。同样衷心感谢莫纳什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的朋友、同事、学生以及莫纳什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尽管比较往往令人不快，但我们要对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罗伯·卡文(Rob Cover)、安东尼·艾略特(Anthony Elliott)、凯瑟琳·弗格森(Kathleen Ferguson)、凯文·哈特(Kevin Hart)、伊莲娜·普利康(Hélène Pouliquen)、凯特·里格比(Kate Rigby)、大卫·罗伯茨(David Roberts)、菲利普·汤姆森(Philip Thomson)、盖尔·沃德(Gail Ward)以及克里斯·华斯(Chris Worth)致以特别的谢意。我们也要感谢艾伦·安文出版社的约翰·埃尔蒙格(John Iremonger)和伊丽莎白·韦斯(Elizabeth Weiss)，他们在这个项目的各个阶段都满怀热忱地支持我们。最后还要感谢莫纳什大学艺术系，这个项目完成后他们为我们各提供了 5000 美元的资助资金。

译者的话

文化研究的历史并不长,从 60 年代英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倡导算起,文化研究在欧美经历了大约五十多年的发展。然而根据文化研究理论的观点,文化研究的对象——“文本”(text)遍布社会的每个角落,文化研究更是横跨人类学、社会学、哲学、文学以及电影研究等多个领域的知识。文化研究透过某个现象的表面,挖掘其与意识形态、种族、性别以及社会阶级等之间隐秘不宣或者我们常常视而不见的关联,由于文化研究关注的是某个现象传递出来的意义,因而为我们对文化、权力以及日常生活进行解读与批判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与理解途径。在中国,文化研究虽然起步较晚,然而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与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纷繁的社会背景下,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有着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因而回顾文化研究经典理论与发展脉络对我国文化研究而言,是极为必要的。

本书是文化研究领域的一本经典入门读物,在国外已出版过多次。这次翻译的蓝本是根据两位作者的最新修订版,旨在为我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以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研究理论派别,勾勒出一幅清晰简明的文化研究概貌。全书一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对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概述,梳理了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关键词,这是因为文化研究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接下来,作者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符号学理论、差异理论等流派的出现对文化研究发展的影响,以及后现代主义背景下文化理论的发展情况,介绍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代表人物及作品,解释了文化研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概念。

正是由于文化研究的丰富性以及在今日学界的重要性,本书的翻译力求准确,方便读者一窥堂奥。书中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尽量采用中文通用的名称,专业术语大多采用经典译名,以便读者辨识理解。然而文化研究理论蔚为大观,本书的翻译产生的疏漏与偏颇,概因译者水平欠缺所致,还请读者见谅。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第1章 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 1

文化的定义 2

文化研究的定义 5

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 9

文化与社会:反功利主义与现代性 11

功利主义及其他 13

第2章 文学与社会:从文化主义到文化唯物主义 19

德国文化主义:解释学与历史主义 20

英国文化主义:从阿诺德到利维斯 23

新左派:汤普森、霍加特以及威廉斯 29

文化唯物主义 32

新历史主义 40

文化研究:从霍加特到霍尔 44

第3章 批判理论:从意识形态批判到文化社会学 52

马克思、韦伯以及弗洛伊德 53

卢卡奇、葛兰西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62

法兰克福学派 65

哈贝马斯: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社会学	71
齐泽克:走向拉康式的批判理论	75
布尔迪厄:从文化社会学到批判理论	79
第4章 符号学: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	85
涂尔干与索绪尔	86
俄国的形式主义:从什克洛夫斯基到巴赫金	91
高度发展的结构主义	94
后结构主义:解构与谱系	105
后结构主义:拉康、德勒兹与瓜塔里	112
第5章 差异的文化政治	119
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和性存在	120
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后殖民主义	130
黑人及拉美裔文化研究中的种族和民族	142
第6章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	154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以及“战后”晚期资本主义	155
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大众	160
对后现代主义的赞歌:利奥塔与鲍德里亚	164
后现代主义与知识分子	168
勾画后现代主义图谱:詹明信	172
后现代主义的政治	178
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185
第7章 文化批评与文化政策	190
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	191
文化研究与文化政策	197
从文化批评到文化工程	200
文化研究与文化变革	203
批评与全球化	206
词汇表	209
附录:学术文化研究的机制化	227
参考书目	229

第1章 文化研究和文化理论

在20世纪最后二十余年,尤其是最后的十年,文化研究作为最具学术生命力的学科之一进入人们的视野。现在除了南极洲之外,它在每个大洲都独立出好几个学科门类。正如西蒙·杜林(Simon During)形容的“自发的全球运动”那样(杜林,1999,p.1),文化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公认的国际性学科,展示出其严谨的学术面貌,从欧洲、美国以及澳大利亚延伸至印度和韩国(参见附录)。由于其运用之广,“文化研究”这个术语仍然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多义性”。一方面,其涵义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研究是对文化的学术研究。然而,问题是当准确地提及“文化”时,我们达不成任何一致意见。还有一种是在字典里运用得最为广泛的抽象名词。人们担忧“本土文化”的独立性,同时也担心自己能否作为“有教养”的个体“融入”生活。他们也担忧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憧憬“文化产业”以及“文化引导”经济复苏的前景。从我们高校教师的专业角度,在考虑我们学校文化研究行政组织机构时我们也会考虑到文化。

然而,这些观点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模棱两可的。当人们担忧本土文化的独立性时,他们可能想到的是不仅体现在个体的艺术活动

中,同时也体现在组织中的独特艺术,例如美术馆、歌剧院。但他们可能更多考虑到的是他们特定的本土生活方式:他们的烹饪方法以及饮食习惯,他们的宗教以及体育运动。“有教养”可能意味着定位 T.S.艾略特的著作中某方面内容的能力,但也可能意味着有一口“上流社会”的口音。“多元文化主义”可能意味着学校里有更多的“移民”文学或者公共电视上有更多的外国电影,但它也可能意味着对那些特定的本土生活方式的改造——在英国咖喱食品像鱼和土豆条那样普遍,或者英式足球取代了美式或澳大利亚足球。一种“文化引导”的经济复苏可能与剧院、影视制作或者更高等的教育有关,但它也可能意味着说服人们如同出售一张贺卡般出卖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为旅游产业买单。至于文化研究,对某些人来说,它明确地意味着经典、精美的艺术品以及高雅的文学著作,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它可能意味着青少年团伙的社会学以及人类学上的近亲关系。问题在于我们使用这些词语的指涉范围大大超过了我们所知的内容。

文化的定义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是威尔士文化理论家,后来是剑桥大学戏剧学教授,他形容“文化”是“英语中最为复杂的几个词语之一”(威廉斯,1976,p.76)。而在他试图定义该词用法时,这种复杂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文化与社会:1780—1950年》(*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中,他主要关注与这个词有关的四种重要意义:一种思维的个体习惯;一个社会的智识发展状态;艺术;以及一个群体的整体生活方式(威廉斯,1963,p.16)。在后来的《关键词》(*Keywords*)一书中,他只讨论了后面的三种用法(威廉斯,1976,p.80)。再后来,他的社会学教材《文化》(*Culture*)再次介绍了第一种用法,将第二种和第三种用法归类为“通常意义”,并将其与第四种用法——更加明

确的“人类学”意义相对照(威廉斯,1981,p.11)。威廉斯区分了这个词的自然和人文内涵、肯定与否定涵义,用法,作为一个名词的演化过程,以及这个词的外延等等。他的思路是清晰的,然而这些困惑和复杂性是“文化”这个词所特有的,并非因为他分析或者表述的失误:“这些变化……确实意味着关于这个复杂词汇所指向的活动、关系以及过程的观点在不断改变。这说明复杂性最终不是取决于这个词,而是取决于使用这个词时的所指在不断变化。”(威廉斯,1976,p.81)这些涵义的扩展和重叠、差异的省略和延续,本身都是“有意义的”(p.80)。

最近,耶鲁大学的英语和比较文学教授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提出文化是“一个煽动性的词汇”,在某些环境下甚至能引发“真实的战争”(哈特曼,1997,p.14)。文化是有价值的,但也是危险的。同威廉斯一样,哈特曼同样注意到该词的复杂性,以及这个词用法的扩展性——“摄影文化、枪支文化、服务文化、博物馆文化、聋哑文化、足球文化”,因此它成为一种“语言学上的杂草”(p.30)。

威廉斯和哈特曼都试图追溯这个词的演化历史和概念。在英国和法国,它最早期的含义指涉的是动物或者植物的自然生长倾向。威廉斯认为在英语用法中,这个词的扩展含义指涉了人类的发展始于16世纪早期,而它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指涉抽象过程则始于17世纪中期(威廉斯,1976,pp.77-8)。他的这种历史观点仍然是英语世界备受关注的权威论述,它影响了艾略特、利维斯、奥威尔,当然还有他自己。哈特曼的观点(也包括威廉斯)更为世界性的,并且有着斯宾格勒(Spengler)、本达(Benda)、纳粹主义以及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等支持者。对威廉斯而言,文化概念包含着解放的愿景。对哈特曼而言,是否存在真正“内涵丰富”的文化概念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仍然只是一个“危险”的开放性问题(威廉斯,1963,pp.322-3;哈特曼,1997,pp.192-3)。

对于哈特曼,这个术语存在诸多歧义的至为关键之处在于,在“文化”作为一般性的理想型、“一个各种概念都能被自由转换的‘字母共和

国””,以及“作为一种具体化或者连带性的特定形式”之间,他认为存在着一种保护前者以对抗后者的决定性需要(哈特曼,1997,pp.36,41)。对威廉斯而言,最为重要的差异在于这个术语在人类学和社会科学上的不同用法。他解释说,“文化”概念:

成为一个“内生”过程的名词,尤其对于其在“智识生活”和“艺术”中的假定作用而言。它也成为表述一般过程的名词,特别对于其在“整个生活方式”中的假想定义而言。在第一种意义上,它在定义“艺术”和“人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第二种意义上,它在定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威廉斯,1977,p.17)。

文化可能像“艺术”一样与社会相对,但这两个词也被近乎共生地定义,表示任何剥离政治和经济因素的事物。哈特曼和威廉斯在这里有着清晰的相似之处,“文化”是相对于“一种文化”而言,而“艺术”则是相对于“整个生活方式”而言。但哈特曼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共性和个性之间——一个普遍的公共空间和一种单独的亚文化;而威廉斯则认为关键的差异在于艺术和整个生活方式两种共性之间。注意这个更显著的差异:威廉斯的社会仍然是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是共性,而对于哈特曼,它已经成为一种由个体集合而成的多元文化的复数形式。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回到威廉斯定义的“共同文化”以及政治—社会多元文化主义的有力观点。然而现在,这不仅是一个学术文化研究上相当基础性的定义,同时也关系到我们社会和文化的未来。

“文化”这一术语的可能内涵是繁多而芜杂的,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更为细致地探讨它们。然而现在,当提及组成我们符号意义宇宙的社会机构、人工制品和实践时,让我们对“文化”“去定义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术语包括:艺术和宗教、科学和体育、教育和娱乐。然而在习

惯意义上,它并不包括通常被视为“经济的”或者“政治的”的活动。这种关于市场的经济上的、关于国家的政治上的以及有时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文化上的三重差异,成为现代社会学理论复兴的主题。例如: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各种生产方式的差异、超国家政治结构以及社会意识的论述(马克思,1975,p.425),以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阶层、党派和社会地位的讨论(韦伯,1948)。但能够明确的是,在所有类似例子的任何一种情形下,自觉性/社会地位/文化(思想/话语等)都主要是一种残存的分类,被定义为除了经济或者政治之外无实际意义的实体。不是工作/阶级/剥削,也不是战争/权力/压迫,借用马克思对宗教的描述,文化成为“这个无情的世界的核心”(马克思,1975,p.244)。但正如将抽象的宗教在苦难众生中得以实践那样,文化也有多种文化形式。因此它在20世纪末美国所谓的“文化战争”中获得难以撼动的地位,在那里它可能同时指代建构学术传统的规范化高等“文化”以及“新文化运动”中人种、两性、代际以及性别的“反文化”。

文化研究的定义

文化战争为文化和文化研究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契机,因为在文化研究没有得出结论的某些危险部分正是美国高等教育新的“主要教条”。正如现在构建的这样,文化研究始终应当归功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先驱性工作。这个中心建立于1964年,在当时的伯明翰英语文学教授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的管理之下,作为一个研究性组织,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成为英国乃至全世界卓越的文化研究机构。后来的曼彻斯特城市大学的英语和文化研究教授安东尼·伊索普(Anthony Easthope)认为伯明翰中心的工作是最为重要的“英国文化研究转折”(伊索普,1988,p.74)。现在的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的交流与文化研究教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认同这一观点:“准确地说,在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尤其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方面,它确实是一个中心。”(格罗斯伯格,1988,p.8)创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杂志》(*Australi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的主编格雷姆·特纳(Graeme Turner),现任昆士兰文化研究和批评中心的主任,他赞同这一观点:“平心而论,伯明翰中心是这个领域发展历史上的研究重镇。”(特纳,1996,p.70)现在来看伯明翰中心是怎样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典型是相当吸引人的。然而它的面目同样显得相当模糊,因为从不存在一种特定的伯明翰模式,只存在一些难以避免的充满歧义的相互矛盾和冲突模式。

“文化研究”的多义性与“研究”、“文化”或者“文化的”相关:现在不仅没有对研究对象达成明确的共识,而且对于如何组织这项研究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对“文化研究”的众说纷纭大致可以归类为四组含义:跨学科或者后学科的研究;对现存学科的政治性介入;一个有着全新的研究内容的全新学科;一个有着新研究范式的新兴学科。在霍加特最初提出建立伯明翰中心的提议中,文化研究就在他的计划之内,其性质从根本上来说跨学科的,但将文学研究作为它“最为重要的”因素(霍加特,1970,p.255)。二十余年之后,他仍然坚持相同的观点:“除了文化研究之外,学生们应当首先有其他的专业基础”,他写道,“一种学术和思维能力的训练,而且是非常严格的训练”(霍加特,1995,p.173)。时髦的“后学科”文化研究概念,发端于《国际文化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的早期文献,与霍加特的跨学科概念区别不大。(参见Hartley,1998,pp.5-8)。然而在将文化研究看做对现有学科的政治性介入的意义上,霍尔(Hall)作为伯明翰中心主任霍加特的继任者,与后者产生了真正的分歧。对于霍尔,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源于其“政治”意义:“文化研究存在着某些风险,”他强调,“在某种意义上,确实不同于许多其他学术探讨”(霍尔,1992,p.278)。类似的“政治性”概念在文化研究著作中都有体现。而在杜林眼里,这种政治性“参与分析的形式”